

哥儿

夏目漱石著

刘振瀛
吴树文译

一个杰出的作家，创作风格是多方面的。

■哥儿 用愤怒、嘲骂、调侃的笑，对金钱万能的社发出鄙夷的诅咒；用明朗、健康的笑，对正义压倒邪恶寄予厚望。

■伦敦塔 根据留学英国参观伦敦塔的体验，令幻想与现实交错，对陷入绝境者寄予悲悯哀婉的同情。

■玻璃门内 作于去世前一年的一九一五年，表现了作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也是一生的自我总结。

■文鸟 是日常生活心底隐衷相交流的记录。

■十夜梦 通过十个梦境，抒发对人生、爱情、事业的疑惑，给予形象的回答，富生活哲理。



日本文学丛书

辛未艾 主编

夏目漱石 著

哥儿

刘振瀛
吴树文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夏目漱石
坊っちゃん

本书根据东京创元社一九五六年五月版译出

哥 儿

〔日〕夏目漱石 著
刘振瀛 吴树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125 插页 6 字数 203,000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198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1,600 册（内精装 600 册）

平装定价：2.20 元 精装定价：3.9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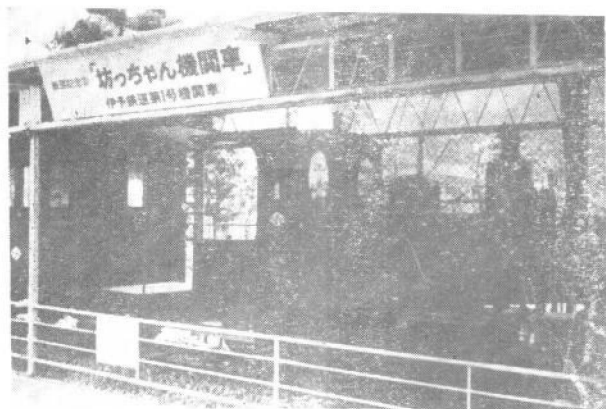
书号：10188·718



作者唯一带笑容的像(《玻璃门内》的
“人为修出来的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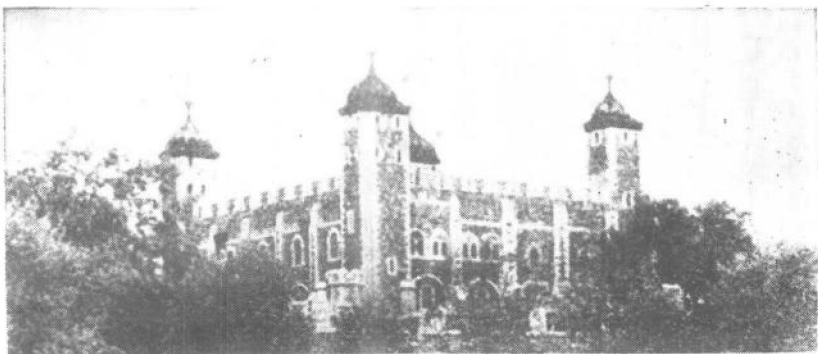
哥儿常在此店吃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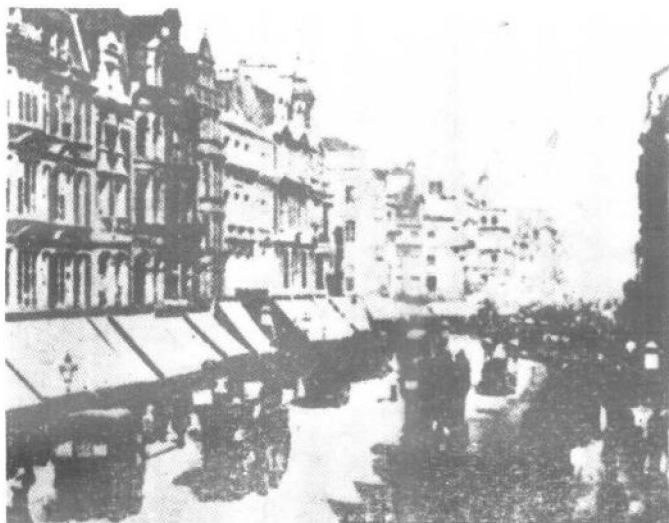
《哥儿》中“跟火柴盒差不多”的火车。

哥儿每天必去的温泉(小说中的“住田温泉”)。





夏目漱石抵伦敦三天后，在1900年10月31日参观了这座伦敦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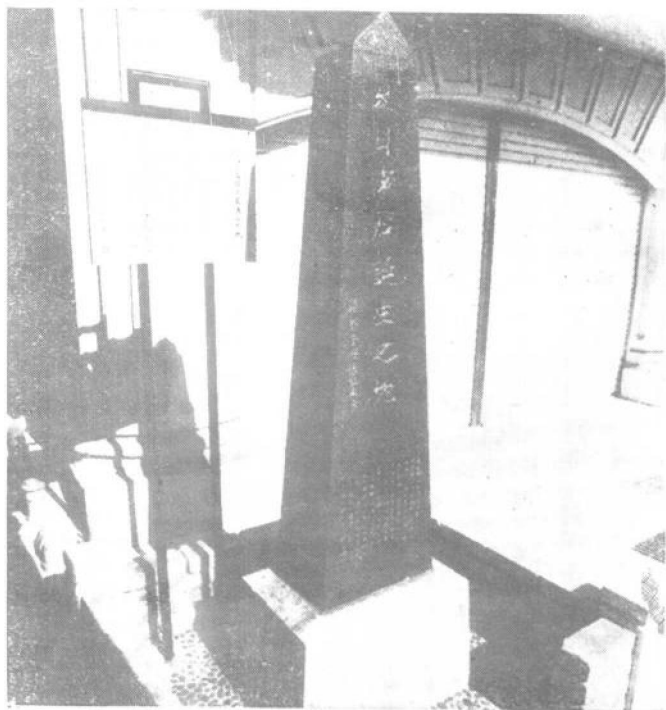
1900年夏目漱石在伦敦时的牛津大街。



1900年12月26日夏目漱石从伦敦写赠正冈子规的圣诞纪念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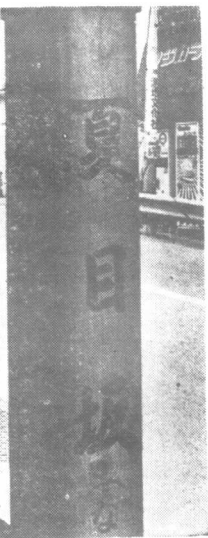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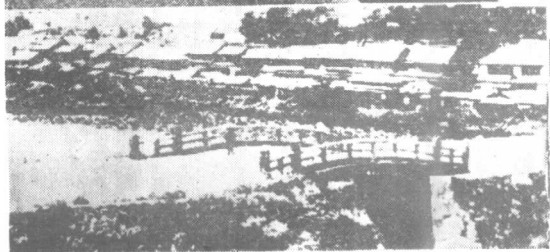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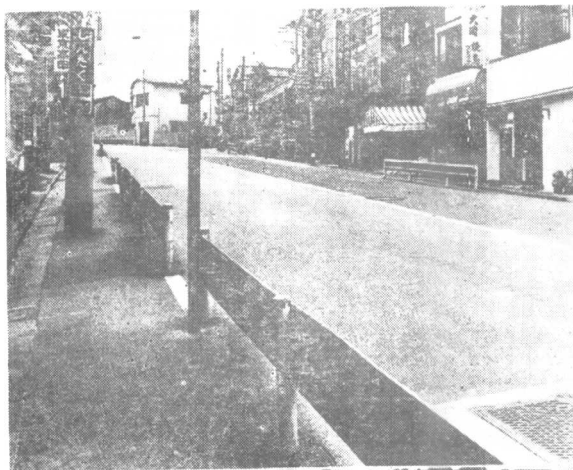
1915年10月，作者在家中的书房外休憩。



东京都新宿区的夏目漱石诞生地纪念碑。

哥儿由此车站乘
车去住田温泉。

1914年12月在书
房写《玻璃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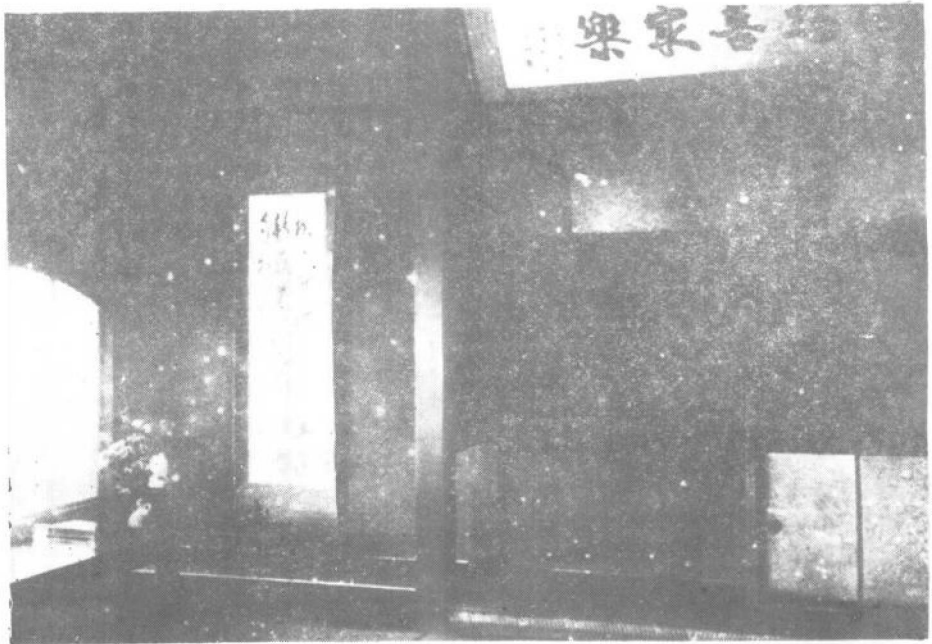


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の「夏目坂」。

当时的牛込区。



当时的松山中学外貌以及
在该校任职时的作者。



作者在松山投宿时的旅馆房间(小说中的“山城屋”)。

译 本 序

—

一个杰出的作家，他的创作风格常常是多方面的。《哥儿》的作者夏目漱石就是这样一个作家。他曾经用愤怒的笑，嘲骂的笑，调侃的笑，对金钱万能的社会发出鄙夷的诅咒，为知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愤愤不平；他也曾用明朗的笑，健康的笑，来表达他对正义压倒邪恶的愿望。到了创作后期，他逐渐收敛起正面批判日本近代化弊端的锋芒，转而拿起解剖刀来剖析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心理机微，揭示生存于日本近代社会中人与人相互伤害而最后又不能不伤害自己的孤独的绝望感。夏目漱石追求的主题不断变换，必然带来他创作风格上的不断改变与创新。大体说，他的前期作品受到日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某些影响，具有绚烂的浓重色调，构成作家独自の幽默风格或俳人趣味^①；而后期的风格则渐趋平淡自然，以适应作家剖析心理机微的需要。不管是哪种风格，都体现了作家的个性，《哥儿》以及处女作《我是猫》的语言和风格，可谓独树一帜，空前绝后。作者曾在书简中告诫过他的学生：“说来奇怪，我讨厌模仿我的特点的文章。对于那些不去模仿我与旁人共通的地方，而是特地去模仿我个人特点的作品，我总感到写这种文章的人是缺少个性的。”这段话说明了他对艺术必须具备个性和独创性的见解；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的早期作品，不为

当时“排斥技巧”的自然主义文学所动，敢于反驳自然主义派作家的责难，走自己的路。

二

《哥儿》是一部中篇小说，故事情节并不十分复杂，是以作者十几年前在地方中学教书的生活体验为基础写成的。但他并不象当时自然主义派作家那样把作家自己客观化，或把周围的人作为模特儿来如实地描绘。他认为用这样的写作方法来标榜作品的真实性未免太狭隘、太平庸，不能真正打动读者。《哥儿》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他这种信念的结晶，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自然主义评论家们责难他作品带虚构性的一种回答。在这部作品中，他有意识地使用了典型、夸张、虚构的方法，使得《哥儿》成为“在日本文学有数的作品中最受欢迎、最熟悉的小说”。

这部作品的主题在于揭露、抨击存在于日本教育界的黑暗现象。作品通过一个青年自叙的形式，写这个青年从物理学校毕业后到一所地方中学去教书时目睹的邪恶现实，以及后来从这所中学愤然离去的过程。由于作者的创作态度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从而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也都分为正义与邪恶两大类，泾渭分明。在邪恶势力方面，有绰号为“狗獾”的狡猾的校长，有绰号为“红衬衫”的阴险的教务主任和绰号为“整脚帮闲”的胁肩谄笑、下流无耻的图画教员；在正义的一方，有哥儿这个憨直的新来教员，有绰号为“豪猪”的爽直豪放的教学主任，还有遭受邪恶势力无端迫害的、绰号为“老秧南瓜”的英语教员，以及

① 俳人趣味：江户时期以来从事俳句俳文创作的文人趣味。生活态度上主张放放脱俗，重视风雅；文风上追求轻妙、谐谑、富于暗示的警句式的表现。

一群在邪恶势力下唯唯喏喏的人物。

《哥儿》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在于作者对日本社会中作为官僚机构一环的教育制度的不满。在这种教育机构下，教育官僚统治着一切，只允许下属对他们的阿谀奉承，推行形式主义、盲从主义的教育，而不允许任何异己者的存在。在这种环境里，尽管整个日本社会在走着近代化的道路，但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却是什么“忠君”、“德化”之类乌七八糟的封建意识与近代科学技能的奇妙结合。明治天皇政府为了造就出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国民”，必然要保留教育制度中的某些野蛮性、落后性和虚伪性。而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产生的倾轧与暗害等等不正行为，也就必然肆行无阻。作者就是把存在于当时日本教育界的这种丑恶现实，用语言加以艺术的集中和概括。尽管表面上写的是一所地方中学，其实，这所中学不过是作者艺术构思中一幅带有普遍意义的图画，是作者成为作家之前数十年厕身于教育界郁积的感受、一次情不自禁的喷射而已。这一点难坏了日本当代具有考证癖的文学评论家，他们查遍了作者在松山中学教书时的材料，发现作品中带有文学士头衔的“红衬衫”并无可与之相当的实在人物，而有这个头衔的只是作者本人。于是他们就只好提出“分身说”，认为这个“红衬衫”是作者自己的分身，而所谓分身，就是由作者来揭示自身内部世界的隐秘。这样一来，就完全抹杀了作者作为一个作家炽烈的正义感，从而也就否定了这部作品本身具有批判精神的重要意义。作者发表这部作品的当时，在致友人的信中就曾经这样写道：“拙作辱蒙推赏，不胜感激。我想，不仅中学，就是高校①、大学，都不会有‘豪猪’

① 高校：战前日制教育中“高等学校”的简称，介于大学与中学之间，类似大学预科。

这类人物。但象‘蹙脚帮闲’之流却到处可见。我本人就在中学里目睹过两、三个这种类型的人物。在高校里，毕竟很少无耻到如此地步之徒（当然与之相似的，大有人在）。总之，这可能是因为在高校中不需要去逢迎校长之故吧。其所以看不到‘豪猪’、‘哥儿’这类人物，并非不存在这类人，而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人，就会被免职，也就不可能存在。不知尊意以为然否。”在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日本教育界的腐败现象的愤懑。可见《哥儿》中的人物，无论是正面人物也好，反面人物也好，都是现实生活作用于作者头脑的结果，作者一反日本近代文学中习见的“圣人也是强盗，强盗也是圣人”那种灰色人物形象的写作方法，爱憎分明地揭示了邪正两种人物，抨击了现实社会。因此，对“红衬裤”这个人物，是不能用什么“分身说”来加以解释的。

日本近代文学中并不乏批判日本近代教育或教育制度的作品。如岛崎藤村的《破戒》反映了日本教育界结伙营私、排斥异己的腐败现象；石川啄木的《云是天才》抨击了日本教育制度的保守和落后；中野重治的《老铁哥的故事》揭露了近代教育中的虚伪性和封建性等等。这些作品在批判日本近代教育方面，虽然各有一定的深度，但它们的基本主题往往别有所在。唯有《哥儿》这部长达九万余字的中篇，自始至终贯彻了作者的这一鲜明的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取得了十分完美的艺术成就。

三

《哥儿》采取的是喜剧式的手法，主要表现在作者对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夸张描写。当然，作者在作品中力图将主人公哥儿塑造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动人的形象，而这部作品的最大魅力，

也的确有赖于它成功地刻画了这个人物鲜明而又复杂的性格。

作品喜剧式的夸张手法，还表现在这部作品中的所有次要人物的身上，以及对环境的描写和事件结尾的处理上。

首先，作者利用主人公哥儿喜欢给周围的人分别起绰号的习癖，很自然地给许多人物赋予了形象的特征。这些绰号如“狗獾”、“蹩脚帮闲”、“老秧南瓜”等等，都是和日本社会中尽人皆知的民俗、风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者除了利用这些绰号取得联想作用和滑稽效果之外，并没有放弃对这些人物特征的细密刻画。作者不仅在这些人物的体态、动作上赋予他们可厌的特征，更主要的是使用白描的手法，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揭示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狗獾”道貌岸然的伪善面孔；“红衬衫”巧言令色，笑里藏刀的阴险性格；“蹩脚帮闲”下贱卑鄙的丑态；“豪猪”的豪放爽直；“老秧南瓜”的那种逆来顺受、失掉了任何反抗意志的可怜相；所有这些，主要都是凭借这些人物的略带夸张的会话，生动地体现出来的。就是那些庸碌保身的其他众多教员，虽然着墨不多，也是根据这些教员的各自身分、习癖，三言两语，惟妙惟肖地传出各自的神态。这种利用人物对话来揭示人物性格的手法，也是来自江户文学中滑稽小说的写作传统。当然作者沿用这种手法，目的在于加强讽刺。在这部作品中，有两个集中揭露邪恶势力的戏剧性场面，一个是为了讨论如何处置学生捉弄教员的会议，另一个是校长与教导主任暗地迫害“老秧南瓜”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去为他开欢送会。这两个场面，已离开了作者贯穿全书的幽默主调，而是出自作者对这种丑恶现实的痛心疾首，为揭开这种脓疮腐肉而发出的呼喊。鲁迅先生说得好：“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这种丑恶的场面，古往今来，又何尝少见。只是由于作家夏目漱石把它

真实地再现出来，便成了对日本教育的强烈谴责，成了对伪善的、堂皇的言辞的绝大讽刺而已。

四

《哥儿》之所以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一方面是由于作品分明的爱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没有沦为一般通俗的道德小说，也没有沦为通俗的滑稽小说。它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主人公哥儿既是事件的叙述者，又是冲突旋涡中的主要参加者。因此，哥儿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就必然要从哥儿自叙的口吻当中，从哥儿叙述事件的字里行间出神入化地显示出来。

日本的“落语”，在作者写作的时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名手的技艺”，一种高度巧妙的语言艺术。许多著名的艺人，全凭模拟“落语”中经常出现的庶民阶级人物（他们通常被赋予阿熊、阿八这类名字）的口吻，绘影绘声地表达出他们的性格特征。《哥儿》的作者正是通过主人公本身独具个性的叙述口吻，通过他与其他人物进行对话时的快人快语，通过他对周围事物所作出的真率的反应与判断，使他的复杂性格、可爱之处、可笑之处，一一立体地再现出来。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哥儿这个人物性格的传统继承性，就不能不说明一下作品中哥儿反复引为自豪的“江户儿”这一传统概念。因为哥儿鲜明的性格特征，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将长期以来一直为群众所熟悉的“江户儿”的气质，加以发展、予以再创造的结果。

在明治以前的江户时期，江户儿气质的形成是武士阶级的精神习尚折射到平民阶层的一种意识反映。它具体体现在游侠

精神上。所谓“男达”精神，所谓“男子汉的意气”（“男气”），指的都是这种平民的游侠精神。如传说中的幡随院长兵卫、唐犬权兵卫，原都是市井中半流氓无产阶级，他们标榜抑强扶弱、惯打不平，重然诺，轻生死，尚侠仗义。于是一般平民便把他们作为理想化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寄托了民众反抗封建压迫的理想。到了江户后期，在十返舍一九^①脍炙人口的作品《东海道中旅行记》（《道中膝栗毛》）中又塑造了另一种“江户儿”气质，作品中两个主要人物弥次郎兵卫和喜多八，都是一种低俗的、轻浮的、滑稽的、超越道德规范的喜剧式人物，他们以“江户儿”自负，所到之处，瞧不起地方的文化、风习、方言等等，引起了无穷的笑料。这种以“笑”本身为目的的创作意图，尽管卑俗，但作为对封建名教意识的一种反动，作品中的人物仍一直活在一般老百姓的心中。

作者正是巧妙地吸取了这一民族文学传统中有益的养分，去掉它的卑俗部分，把它纳入到近代文学的严肃主题中来。如：哥儿刚正不阿的人生信条，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正义感，对弱者、受害者的同情，对伪善、对奸猾邪恶行为的疾恶如仇，对自身错误的坦荡胸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这个人物可贵的品质。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哥儿这个人物加以神化，而是在赞扬的同时，也刻画了他的许多弱点。在本书一开始，作者就向读者展现了这个人物少年时期性格上的鲁莽、浮躁的一面，在以后的情节发展上，就更加暴露出他的轻信、盲动、急于判断、容易上当受骗的种种复杂性格。特别是他继承了“江户儿”浮薄气质的一面，对地方的风习、语言具有轻蔑的心理，表现出一种来自大都市

^① 十返舍一九（1765—1831），江户时期滑稽小说的作者。

东京的盲目的优越感。所有哥儿身上的这些弱点和本质上的许多优点，形成了主人公复杂多歧的立体性格。当然，哥儿性格上的许多弱点，又是和这个人物的单纯、憨直、爽朗的个性，以及不谙世事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使读者把同情集中在他充满正义感的可贵品质方面，而对他的所谓“江户儿”的另一面——轻浮鲁莽的弱点，则作为一种稚气与憨态来加以宽容。作者这样刻画哥儿，不但没有破坏这个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反而增添了读者对这个人物的亲切感。

一部作品能否为读者所喜爱不衰，除了它的思想高度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和它是否采取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有重要的关系。作者在写作《哥儿》的当时，正是西方自然主义思潮支配整个日本文坛的时期。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许多自然主义作家锐意仿效西方近代文学的写作方法，很少有人想到发扬文学的民族传统问题。作者当时置身于文坛圈外，以他丰富的学识和对江户时期平民文学的素养，敢于逆潮流而动，写出了《哥儿》这样独具个性的作品，这正说明了作家的难能可贵之处。日本的作家兼评论家伊藤整在评论这部作品时，特别着重指出了这部作品在刻画人物性格上的特点。他写道：“这是一部将日本式的性格，使用日本式的手法描绘出来的作品”，它“描绘了典型的日本人”。他又说：“主人公的乐天性，他的同情心，他的天真无邪，还有其他人物的日本式的肮脏、气量狭小、卑劣、软弱、充英雄好汉，所有这些都的确是日本人的真实性格。”伊藤整的这番话，抛开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整体意义不谈，至少在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问题上，道出了为什么这部作品能够赢得日本读者喜爱的秘密所在。